

#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与经验研究

郭路<sup>1</sup>, 颜翀<sup>2</sup>, 徐晓婧<sup>3</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了生态文明建设起步探索时期、发展深化时期和走向成熟时期, 并在发展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与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基本成型、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并积极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解读。同时, 我国通过“四个坚持”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在思想、党建、经济与民生方面积累了必须坚持生态文明思想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必须坚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理念的经验, 为高质量发展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指引和借鉴。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发展; 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23)03-0122-07

在现实经济中, 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生态环境恶化, 针对上述两难问题, 不同国家分别采取不同解决方式。由于生态环境具有外部性, 具体表现为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 西方社会主要通过“林达尔市场”以内部化环境负外部性来治理生态, 但“林达尔市场”无法克服环境非排他性且其有效性依赖于对个体负外部性效应能低交易成本地准确测量, 这导致对环境的治理需支付较高成本。我国则选择从环境规制角度内部化环境负外部性, 由于环境规制不需支付交易成本, 从而提高了环境治理有效性, 但也存在制度建设响应迟缓现象。因此, 中国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 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 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

设, 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sup>[1]</sup>。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 十八大以来, 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 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sup>[2]</sup>。为此, 本文在梳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沿革基础上, 总结发展成就与经验, 以期对高质量发展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 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沿革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经艰辛, 从起步探索, 到发展深化, 再到走向成熟, 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破解不同时期的生态难题, 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的回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 生态文明建设起步探索时期(1949—2012)

第一, 我国开展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奋力探索。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开始了快速工业化、城市化, 经济增长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累积了许多资源环境问题, 造成了严重负

**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研究”(2021MYB002)

**作者简介:** 郭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颜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徐晓婧,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面影响,其中1971年底爆发的官厅水库污染是典型代表,这次事件拉开了我国在资源环境保护领域率先改革的序幕。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明确了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32字工作方针,审议通过《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开启了中国资源环境改革,也标志着中国人环保意识的觉醒<sup>[3]</sup>。

第二,我国开展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工业过度发展与对环境保护的忽视导致我国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双双居高不下,进一步推动我国资源环境体制改革。环境保护法从1979年试行到1989年正式成为基本法,据此建立起一整套资源环境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环境保护于1983年上升到基本国策,随后形成环境保护三大政策和八项制度,逐步推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构建和资源税费改革。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启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顶层设计阶段,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之一。随着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热潮,低碳发展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热点。我国在资源环境制度体系基础上,初步探索了生态文明法律政策制度体系,并初步建立起生态文明管理机构体系。

## (二)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深化时期(2012—2017)

第一,党的十八大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定下了总基调。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民福祉、民族兴亡以及人类文明兴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十八大开启。同期,我国资源环境领域的体制改革也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党的十八大首次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单篇谋划,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高度,实现与其他四大建设全面协调<sup>[4]</sup>,并将生态文明

建设写入党章,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具有可持续性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为政治建设开启了制定法律法规和发展战略的新视角和新思维,为文化建设培育了具有生态文明理念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为社会建设协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生态资源利益分配,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自然载体。生态文明建设如一条“红线”将其他四大建设紧密结合,形成一个有机、系统整体,不断开创美丽中国新局面。

第二,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建设美丽中国。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用严格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纳入新发展理念,再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重要文件的出台,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其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发展大局,是建设美丽中国应有之义。绿色发展理念着眼于经济与生态协调共赢,是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是美丽中国目标的行动指南和顺利实现的灵魂,这是关系到我国整体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途径。

## (三)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成熟时期(2017年至今)

第一,党的十九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史无前例地位。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多次提及,如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千年大计”、把“美丽”纳入国家现代化目标等,彰显了党和国家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基于对人类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的现实考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重大论断被正式提出,这是对传统现代化理念和模式的生态转型并引领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认识,是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前提条件和伦理规范之一,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理论基

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和本质特征,也是全球生态治理的美好愿景与目标追寻,表明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有机统一。以违背自然、对抗自然、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表面繁荣是不可持续的,是我国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生态安全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常备不懈才是硬道理,这就需锻造和提高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加强对环境风险的有效防控,这也是呵护自然环境、稳定自然生态系统的需要。

第二,美丽中国绿色画卷正在展开。从2017年“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等内容被写入党章,到2018年“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地位。从党的十九大指出的“千年大计”,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的“根本大计”,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认知的深化。从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出重要部署,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生态文明建设新蓝图,再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日益加强并实现新进步,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全面提升以及加速向绿色低碳发展方向迈进明确了新路径。

## 二、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基本成型,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并积极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并迈上新台阶。

### (一)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基本成型

我国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步伐,逐步构建起以“四梁八柱”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着重加强制度顶层设计,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打出一整套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组合拳”,生态文明建设日益拥有制度刚性规范,“四梁八柱”基本成型,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全面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离不开相应的管理机构来落实,支撑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管理机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九龙治水”

到“统一保护、统一修复”。进入新时代后,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务院行使的一项重要职权被写入宪法,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又建立起一整套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管理机构。中华文明一直蕴含生态文明理念。从先秦开始,中国历朝除元朝外,都建立了专门管理生态环境的机构体制——“虞衡制”。其中,“虞”负责事前防护;“衡”负责事后问责,执行“虞”颁布的禁令。“虞衡制”对生态文明机构设计也有启发,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在生态文明领域新组建了两大机构——自然资源部起到了“虞”的职责,而生态环境部起到了“衡”的职责。机构改革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做好以下工作:一是通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加快建立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进一步明确自然资源所有权、监管权;二是加强协调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内部所存在的利益冲突及职权分割;三是加强协调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从中央稳步向地方推动改革,以免出现操之过急、“一刀切”的情况。

“四梁”是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以及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所构成的<sup>[5]</sup>,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八柱”是由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所提出的建立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所构成的,对“四梁八柱”起到牵引和支撑作用。“四梁八柱”是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从源头、过程和后果三方面进行的制度约束。其以源头严防做好基础性工作,以过程严管做好主干性工作,以后果严惩做好保障性工作,体现了系统性、科学性、完整性、协同性的特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等一系列重要制度,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创新加速推进,为绿水青山进一步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 (二)我国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是当前解决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生态环境短板与堵点的重要抓手,是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和新发展阶段特征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我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2018—2020)行动计划”实现阶段性收官,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并得到人民群众广泛认可,生态满意度提高至2020年的89.5%。能精准反映我国生态环境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有以下事实:2016—2020年整治修复海岸线1200公里、滨海湿地34.5万亩;2021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7.5%;2017—2021年全国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上升17%;森林覆盖率达到23.04%;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全国陆域面积的18%;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双双超90%。污染防治攻坚战通过开展生态环保督察、禁止进口外国垃圾、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等重大举措,促进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等结构实现加快调整<sup>[6]</sup>。

通过着力化解生态环境难题,我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优质生态产品有效供给。这不仅增强了人民群众在生存质量、公平正义、平等参与等方面的获得感,还为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基本保障和重要途径。具体来说,生态惠民解决了人民群众生存型民生需求;生态利民解决了人民群众发展型民生需要;生态为民满足了人民群众品质型民生需要;与此同时,作为新发展机会的绿色生产、绿色发展,为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提供了新路径。

## (三)积极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生态环境的非排他性决定了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治理还需基于全球视角展开,这要求我国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断将自身发展融入深度的国际合作之中,努力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参与重大国际环境规则的制定和国际承诺的履行。为此,我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并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积极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作出中国贡献。从

巴黎气候大会到G20杭州峰会,习总书记把各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统一起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将绿色发展理念推向世界,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目标导向和动力源泉。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将绿色低碳转型提升到经济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相互协调的新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推动开展南南合作。特别是在气候变化领域,我国始终坚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通过深化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积极援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我国将打造绿色“一带一路”与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融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之中: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强生态合作,在政策、技术、资金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并把气候治理目标纳入“一带一路”建设,使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 三、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四个坚持”(即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科学指导、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及坚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理论和实践成就,并在发展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 (一)必须坚持生态文明思想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

面对复杂形势和诸多挑战,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科学指导。由于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关系的演变规律把握不足,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面临重重挑战、存在众多问题。世界诸多文明体皆因生态环境问题先后衰亡、湮灭或被替代,只有中华文明从未出现文明中断,至今繁荣昌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描本,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坚实思想保障。

### 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汲取了人类文明

发展历程中国内外古往今来的生态智慧。该理论的形成既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又以现实实践为基础。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文明兴衰产生巨大影响,文明起源依赖于适宜生态环境,文明延续基于可持续的“生命支持系统”,生态环境衰退会导致古代文明衰落,甚至过度改造生态环境会导致古代文明消失,所以找到与自然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的生存和发展平衡点是直接影响人类自身生存继而决定人类文明兴衰的重要智慧。中华文明吸取了优良生态环境孕育和促进文明发展的经验,也及时吸取了生态环境破坏导致文明衰落的教训,成为世界上唯一实现数千年不间断发展的人类文明,这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奠定了深厚历史基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广泛吸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共识以及中国共产党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经验,体现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鲜明特点,也显现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包容以及中国共产党人胸怀人类共同命运的宏大格局。

第二,要根据新实践、新理论的发展,不断丰富和拓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为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升到了新高度,为人类文明进入新时代打开了大门,具有创新理论意义和重大现实价值。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谋划远景蓝图,多角度、多层次地对生态文明内涵要义和建设方案进行探索和创新,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过程,不仅能帮助我国解决好突出环境问题,而且能通过完善生态制度建设、推进国际生态合作共赢等途径促成思想实践。在新发展阶段要以绿色低碳发展合力推动新发展格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现代化进程,保障“十四五”规划目标、2035年远景目标和现代化强国目标顺利实现。

(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不同于资本、劳动力这类具有排他性的竞争性要素,生态环境明显不具有排他性,竞争性企业往往在其决策中不会在生态方面进行配置,造成

个体最优与整体最优间的不一致,这就需要计划者从整体角度进行规制。在我国,经济生活各方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整体决策的。针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作用不断凸显。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凝聚社会各方广泛共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心怀“国之大者”,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取得重要成就的首要历史经验。

第一,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在党领导国家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事关党的长期执政,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内容。只有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才能自觉担负起政治责任,激发出强大力量。实现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着力点在于建立和完善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既要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党建活动之中,又要用生态文明领域的党建成果引领和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特别是要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全党政治理论水平,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工作实践,提升解决问题能力,从历史和现实双重考虑,从新时期党和国家发展全局高度,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全面领导,推进执政理念、规章制度系统性变革,为生态文明思想建设规定实践道路和发展方向。

第二,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监管考核体制。党的政法部门要加强在生态文明领域的执法监督检查和专项调查工作,针对生态文明领域重难点问题进行系统调查,从各方寻找根源。作为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生态环保督察和考核评价制度体系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从“环保督查”到“环保督察”,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经历了逐渐成熟的发展历程,权威性不断增强,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提升到新水平。随着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深入,要健全生态环保督察机制,确保这一制度发挥更大作用。同时,要通过依法治党带动依法行政,不断提高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政策执行力,全力推进生态治理工作。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倒逼”机制,要构建生态文

明建设责任制度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综合创新指标、生态指标、社会效益、可持续性等方面评价,并建立健全在考核评价基础上的责任追究,将环境改善情况与干部考核挂钩,让生态环境绩效考核真正成为一种制度约束。要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监管考核体制的深化改革,拓宽监督层次,坚持事前预防、事后监督和事后调查相结合,实时监测生态环境质量,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加显著作用。

### (三)必须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性

生态环境并不像其他竞争性要素那样直接进入生产,它会以类似消费的形式进入居民效用,影响社会福利;另外环境破坏往往以生产副产品形式出现,这会产生居民在消费与生态环境间的权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权衡需在计划者整体考量的基础上才能完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体现了良好生态环境会以类似生产资料的形式对社会福利产生影响。从长期看,良好生态环境不仅会改善当代社会福利,还会改善将来社会福利,绿色发展理念、绿色财富观念体现“代际公平”可持续发展理念。从自然和经济社会关系看,自然不仅为人类发展提供了生存环境、生产资料以及容纳和化解废弃物的场所,还为人类提供了精神服务。在协调“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这两者关系时,要把握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度”。

第一,发展与保护要同时兼顾。在马克思生态思想中,分析了人、劳动及生产的二重性理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二重性,恩格斯指出社会经济价值与自然生态价值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其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必须把社会经济价值和自然生态价值统一起来协调发展,必须遵循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规律,把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控制在自然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积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动态平衡,为实现开发与保护的协调发展指明新途径<sup>[7]</sup>。根据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劳动实质上是生物体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生存发展<sup>[8]</sup>。人与自然是共生关系,从内在来

说,要求人类对自然要建立情感认同,要对自然怀有发自内心的爱护之情,而不是简单地把自然当作外物、死物。清洁的水域和郁郁葱葱的山脉既是自然资产,也是经济资产。通过自然环境获得经济产出,要在不降低或几乎不降低绿水青山数量和质量的同时带来金山银山,或者在对自然系统产生较小损害的同时采取补偿性措施(如植树造林、生态修复等),使得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形成良性循环关系,推动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由零和博弈转向和谐统一,从而更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不破坏环境,还要促使生态环境向好的方向发展,改变原有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以恶化居民生活环境为前提的增长方式,坚定走绿色发展这条人类文明发展范式转向的现实路径。不能简单地把发展和保护对立起来,而应从整体和长远角度看待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充分利用综合、互补和协调的发展和保护方法,统筹保护和发展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创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机制。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对发展观的绿色革命,必然要更新原有发展观、价值观和财富观,实现传统发展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型<sup>[9]</sup>。不仅要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即建立“绿水青山”的保护机制,还要通过生态环境的改善实现生产力水平发展和提高并促进更高层次的发展,即建立“两山”实现机制。一方面,要通过建立生态经济体系,使绿水青山提供的优质生态产品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综合价值,从而维护“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要使金山银山带来的物质财富和技术创新转化为绿水青山的自然价值保护和自然资本增值,从而实现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协调统一。以生产方式转型推动绿色发展举例,绿色发展要求在产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都对生态环境不造成危害,真正推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立足地方特色优势资源和发展条件,科学合理选择、规划和运营生态农业、特色旅游业等生态产业,并发展好物流、金融、设计等相关配套产业。同时,将绿水青山带来的经济收益重新投



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消费,进一步提升环境质量,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 (四)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理念

生态环境以公共品形式在经济中出现,这意味着它是供全民享用的,而不是只服务于部分群体,需满足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随着经济发展,公共品供给也应相应提高,进而体现高质量发展应有之义。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优美生态环境是重要的民生新需要。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人民主体作用发挥的结果,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在和未来,也必然要依靠人民当家作主来推动。在民生领域,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以系统观念统筹生态保护和修复,由以生态问题为导向的治理转向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为导向的治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恢复的关键在于恢复生态系统必要的结构和功能,由要素分割向系统统筹转变。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强区域生态治理合作,正确处理好当前与长远间关系,从简单地提升“绿化率”转向“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从“生物控制”为主转向“生态屏障构建”,从“工程建设主导生态修复”转向“区域生态空间管控”。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充分发挥山地、森林、农田、湖泊、草原等生态系统的固碳作用,推进碳中和目标实现。要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维护生态系统稳定完整,提高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和水平,给自然留出更多修复空间。

第二,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定位和层次发生重大转变,从对物质依赖转变为追求生活品质。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是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提供的最终服务与产品。优美生态环境对应的是生态系统自

然要素存量,优质生态产品则是优美生态环境产生的流量。优质物质产品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蔬菜、水果、鱼、肉等产品不断升级的物质需求,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安全和健康”。优质的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水源健康、空气净化等自然方面以及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等服务方面的需求。另外,由于我国生态环境资源公有,人民群众可以平等消费、共同享用良好生态所提供的清新空气、干净水源和适宜气候,可以实现“代内”和“代际”共享以及“国内”和“全球”共享。

#### 参考文献:

- [1] 鞠鹏、燕雁:《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2日,第1版。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3版。
- [3] 郭兆晖:《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40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 [4] 段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启示与展望》,《中州学刊》2018年第9期。
- [5] 兰红光:《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3日,第1版。
- [6] 王倩、蒋春来、黄津颖、王晓婷、袁子林、杨书豪、陈鹏:《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阶段性成效评估研究》,《中国环境管理》2021年第5期。
- [7] 秦书生、王新钰:《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演进历程》,《城市与环境研究》2021年第2期。
- [8] 郭兆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初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
- [9] 黄承梁:《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核心价值》,《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2期。

[责任编辑:房宏琳]